

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理路 及其实践路径

岳爱武

【摘要】网络空间的全球化纵深化发展,创新了点对点的链接,突破了人类交往的疆界限制,跨越了人类活动的时空牵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样式和思维定势,使得网络空间一跃成为“各类思想”“各种思潮”“各色主义”交流交织交锋的主阵地,成为不同意识形态输出、角力、碰撞的主战场,构成了意识形态新的生存空间。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呈现出供给主体碎片化、供给内容冗杂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供给方式单一化等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不仅严重扰散了网络空间的良序运行,而且扰乱了国家整体意识形态的安全秩序。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嫁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思路,坚持遵循德法兼治,严格规范意识形态供给主体行为;着力净化,严厉防范错误意识形态内容泛滥;做好灵活整合,科学汇纳非主流意识形态合理成分;夯实舆论阵地,大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力度等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我国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关键词】网络空间;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变革重塑了人类知识的获取、组织、传递和交流,间接改变了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治理环境的同时,直接影响了以信息传递为基础的社会交往方式”^①,诚如习近平所言:“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②依托于虚拟、交互、数字化的互联网平台,以“开放性”“零壁垒”“无边界”“广覆盖”“去中心”“泛在化”的特质打破了时空界域对人类生产生活的羁绊,创新了点对点的链接,构成了意识形态新的生存空间和交往场域,一跃成为“各类思想”“各种思潮”“各色主义”交流、交织、交锋的主阵地,成为不同意识形态输出、角力、碰撞的主战场。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呈现出供给主体碎片化、供给内容

岳爱武,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心博士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210023)。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资助项目“网络信息化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研究”(2015M581827)、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供给侧改革”(KYCX17_0908)研究成果。

①夏一璞:《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97页。

冗杂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供给方式单一化等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不仅严重破坏了网络空间的良序运行,而且淆乱了国家整体意识形态的安全秩序。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嫁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思路,通过对供给端的顶层设计,坚持遵循德法兼治,严格规范意识形态供给主体行为;落实肃清毒瘤,严厉防范错误意识形态内容泛滥;做好灵活整合,科学汇纳非主流意识形态合理成分;增强有效运作,大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力度,全方位深化我国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创新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理路

随着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这种当代最发达的信息通信技术与网络传播方式,与意识形态、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由潜在逐渐显露出来,“互联网与它所传播的信息之间并不是单纯的载体和内容,互联网在改变意识形态传播形式、原理和技巧的同时,也被意识形态所改变,具有了意识形态属性。”^①所谓网络意识形态,并不是与传统意识形态相互平行、相互并列的另一种意识形态样式,而是传统意识形态与网络信息技术嫁接、融合而成的“特殊”而“全新”的意识形态范式,是“传统意识形态各要素在网络信息空间的延伸和再现,并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②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在建设过程中呈现出供给侧结构性失衡——主流意识形态的供给不能切实有效引领网民的精神需求,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扩散以至泛滥则逐渐侵扰了网民的基本价值判断。为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与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着力解决网络意识形态的供求失衡问题刻不容缓。“供给侧改革”理论的提出,不仅带来了新颖的思考角度,而且提供了不同的解决路向。

(一) 必要性诉求:供给侧改革是深化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所在

“通常情况下,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往往呈现出‘流动’的态势,它会随着特定诱因而发生,又随着特定诱因的消失而淡化、偏移甚至中断”^③,即是说,与现实社会的商品类似,个体意识形态的价值选择具有主观随意性和筛选自由性,同时我国对民众的意识形态教育形式以价值引导为主,而非采取硬性灌输抑或权威迫压。充分尊重和保护个体进行意识形态选择的主观意向,势必导致民众在面对多元思想、多种精神、多层价值需求条件下,催生了多样的意识形态供给主体——“公众既是传媒的接受者,又是传媒的建设者;既是传媒所传播意识形态的客体,又是传媒所传播意识形态的主体。”^④尤其在网络空间这一“反控制”“去中心化”的虚拟世界,多元多样网络意识形态在此交流、交融、交锋以至交战,给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庸俗意识形态、错误意识形态以可乘之机。表面来看,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反映出的诸多问题是网民丰富多样的意识形态需求引发了各意识形态供给侧主体的粉墨登场,由需求端诱发了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但实质而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供给不足和供给失语以及对不良供给主体的管控不当引发了网络意识形态危机。当前网络空间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供给虽有量的扩张,但起决定作用的质却远未达标,相关的宏大叙事性宣传尽管“铺天盖地”“虎虎生威”,但由于缺乏灵活的话语表达方式,机动的话语传播形式和有效的话语传播力度,难以形成充分有效的供给,对网民进行情感渲染的同时忽视了理论根基的深植,导致网民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解决网民价值需求问题上仍显空洞与苍白。加之,我国对不良意识形态供给主体的管控基于技术的原因未能达到全面化、系统化、无漏洞化的制约,导致各类错误意识形态“蠢蠢欲动”“见缝插针”,进入网

① 《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第1页。

② 姚元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探究》,《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③ 史献芝、严凤莲:《转译界面: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恰切进路》,《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④ 余培源、孟文静:《意识形态在网络时代》,《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民精神需求的市場,以誘惑性、通俗化、網絡化的言語吸引迎合網民的“潛在”需求。因此,供給側問題才是網絡意識形態建設的關鍵所在。列寧曾指出:“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會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①為此,提升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空間的根本性話語地位和主導性話語體系,不能單方面依靠網民的價值呼喚來實現,“以需求牽引供給,則供給永遠滯後於需求;以供給牽引需求,則供給一定走在需求前面。”^②所以,唯有從供給內容、供給手段、供給機制等方面實現全面優化,才能提高主流意識形態對網民意識形態供給的有效性,才能將網民的多样化意識形態需求轉向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方向。同時,強化對不良意識形態供給主體的管控,避免網民“異化”的價值訴求探尋到“契合”的精神市場,從而進一步淨化網絡意識形態發展的生態環境。

（二）重要性彰顯：網絡意識形態供給側改革回應國家意識形態整體安全向度

互聯網是意識形態工作的主戰場、前沿陣地和搶奪要地,“日益成為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網絡輿論直接影響着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③,所以,“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④網絡意識形態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建設至關重要的環節和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其安全與否不僅關係到承載它的網絡文化作品是否符合我國文化的主旋律,是否正確引導網民的價值取向,是否維持網絡空間的風清氣朗,更是通過網民身份在虛擬與現實間的切入轉換,將這種影響有形無形地延伸、映射到現實社會。“意識形態安全始終是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民族利益、保障國家安全的一道堅固屏障”^⑤,“在這個輿論鬥爭的主戰場,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係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⑥相反,如果黨和國家不能佔領網絡意識形態鬥爭的前沿陣地,有效引領網絡意識形態鬥爭的主戰場,使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成為網絡空間的主旋律,那麼將會大大降低黨和國家在虛擬空間的意識形態影響力和控制力,甚至失去互聯網這一重要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平台和媒介,“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⑦而網絡意識形態治理工作的關鍵在於時刻注重加強對其供給側的管理。

伴隨網絡空間開放的持續深化,共享的深入交融,傳播的深度延展,應用的廣度拓寬,致使網絡意識形態的供給變得日益多向而複雜——“暗藏在網絡之中的是神秘的看不見的手——一種沒有權威存在的控制,一種由複雜性而生的零亂之力。”^⑧一方面,西方國家依托先進網絡技術的優勢,不斷滲透以“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為主要內容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造成大量的錯誤供給與虛假供給,混淆了網民的視聽,擾散了網民的心態,動搖了網民的立場。另一方面,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們獲取信息愈發便捷,精神需求與文化品位也隨之提高,但目前我國的文化生產力水平仍滯後於人們的精神需求增長,導致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空間中的供給乏力甚至無力,誘發吸引力不足,說服力不夠,穿透力不強,凝聚力減弱。要開辟網絡意識形態治理的新常態,回應國家意識形態整體安全訴求,就要“深入開展網上輿論鬥爭,嚴密防范和抑制網上攻擊滲透行為,組織力量對錯誤思想觀點進行批駁。”^⑨而通過深化網絡意識形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妥善處理好意識形態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係,既嚴厲打擊錯誤意識形態的供給,以提高網民的價值辨識力,消除網絡

①《列寧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頁。

②邱方明：《文化領域也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前線》2016年第2期。

③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北京：學習出版社，2018年，第220頁。

④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北京：學習出版社，2016年，第193頁。

⑤趙興偉：《關於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若干思考》，《社會科學輯刊》2012年第4期。

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第220頁。

⑦《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42頁。

⑧[美]凱文·凱利：《失控：全人類的最終命運和結局》，東西文庫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39頁。

⑨《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第29—30頁。

意识形态供给的安全隐患,又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供给的质量与效益,主动贴近网民更高层级的精神需求,实现更为有效的意识形态供给。

(三) 价值性契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切网络意识形态深层次治理

供给侧改革,全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和国家在梳理西方“供给学派”发展脉络、理论主张的基础上,针对“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面临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所做出的宏观经济决策,其本质是“提高整个国家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优化经济结构,破除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桎梏,寻找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新动力。”^①合理嫁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深化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两者的关照重点均在于供给方,注重从供给侧入手调整需求端的变化,更是因为供给侧改革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供给侧改革是超越供给本身的‘法治’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让合法的主体都有权利供给,不要管制限制人们的供给能力和愿望。二是把不合格的供给主体改造成合法的供给主体。”^②可以说,善于利用合法的供给主体以及积极改造不合法的供给主体,其目的都在于有效增加供给的质量。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供给问题恰恰在于质的不达标。秉承供给侧改革的路径思维,一方面,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应当发挥党政群体、网民个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在网络空间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通过法律法规保障合法意识形态供给主体的发言权以及严厉追究他人对其的人身攻击,并且由党和国家出面为遭受错误甚至反动舆论攻击的合法意识形态供给主体正名、去污,让合法的意识形态供给主体都能“敢于发声”“主动发声”和“助力发声”,以微小的视角和亲身的体验切入宏大的价值宣传中更显说服力与穿透力。另一方面,对不合法的意识形态供给主体进行“合理限制”和“积极改造”,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优越性、科学性展现来实现对不合法的意识形态供给主体的感染和感召,真正遏止、消除不良的意识形态供给。当然,对于顽固的、不接受改造的错误甚至违法的意识形态供给主体,则必须采取强硬态度以“根除”的手段来维护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③,因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④

二、供给侧结构性失衡: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侧现状

开放共享性、虚拟实在性与自由脆弱性是网络空间的主要特征。“开放共享性”表明网络社会是个开放而非封闭的系统,任何人只要通过网络协议,就可以在网络空间自由发布、传播、接收信息,“互联网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合二为一,人际交往和大众交往也融为一体”^⑤;“虚拟实在性”意味着网络社会与实体社会之间是可以交互作用的,实体社会的“实然”可以反映到网络社会当中,而网络社会的“虚拟”反过来又可以作用于实体社会,“人们从传统的物理空间转移到网络社会中,隐藏在数字化符号之后从事自己的活动,行使虚拟社会赋予的权利”^⑥,必然造成“线上线下”同向共频、水波互动的万千景观;“自由脆弱性”意指网民在网络社会可以自由地获取信息、发表言论、进行信息交流,但同时,由于网络信息的供给主体难以管控,供给内容难以辨别,供给方式难以把控,容易导致网民产生

①冯蕾,陈晨:《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经济》,《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2日。

②吴敬琏:《供给侧改革》,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第172页。

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7页。

④《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37页。

⑤《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第6页。

⑥孙午生:《网络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放任、冲动乃至攻击行为,尤其在意识形态安全层面,多方意识形态供给主体在网络空间致力于传输代表自身利益的价值观。网络空间这些特征,一方面使我们“迎来了大众麦克风时代,从精英民主到社会大众,从指尖上的民主到拇指话语权,公众的话语权得到充分释放,不同利益阶层隔空喊话,表达利益诉求”^①,另一方面,使得互联网“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②,再加上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方式相对单一,传播手段相对单调,传播内容相对枯燥,致使创新性缺乏、生动性不足,更是弱化了对网民的价值吸引和精神引领,以致引发了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侧结构性失衡。

（一）供给主体碎片化,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根基

“供给主体是意识形态的源头和文化、思想观念的传播者,对供给客体具有价值导向和引领作用。”^③我国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侧问题的关键在于供给主体的碎片化状态难以消除,党和国家对于各类供给主体的管理未能形成系统化、常态化的制度体系,给不法分子留有“漏洞”和“罅隙”,这为错误意识形态的滋生提供了“契机”和“温床”。网络意识形态的供给主体主要有三类: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核心的国家供给主体,是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力量、主导核心和旗帜方向,通过掌控的国家宣传机器积极向网民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科学性;以企业、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供给主体,他们既在企业、组织文化中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精髓,又追求市场化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与效益最优化,难免会裹挟功利主义色彩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潜在威胁;而在自媒体时代,最具影响力最难把控的供给主体是广大的网民,主要集中于三大群体中:一是受众广泛的“网络大V”,“他们可以在各大论坛、微博、QQ群等媒介上召集成员,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和交流,并形成各具特色的相对独立的‘圈子化’的意识形态,而这种‘圈子化’的意识形态虽然不成系统,也成不了主流,但它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巨大的。”^④二是积极传播与正向发声的网民,他们坚定地站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第一线,以大部分党员和理论界学术界的学者等为代表。三是时常沉默、偶尔发声的网络看客,他们大多对网络意识形态纷争漠不关心,也难有坚定的价值立场,往往反映出严重的利益驱动性。由此可见,基于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主体的多样和多元,思想变化的多端和复杂,势必导致在网络空间中出现淡化、丑化、弱化甚至妖魔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同时,党和国家对于各类供给主体的监管过于松散,没有形成体系化、规范化、常态化的治理机制,各供给主体以利益驱动为张力而自说自话,严重侵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这种碎片化问题诱使各类非主流意识形态泛滥于网络空间,致使“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⑤,严重弱化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指导作用和主导地位。

（二）供给内容冗杂化,侵蚀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当前我国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供给主体的碎片化状态,意味着代表其利益诉求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纷纷蜂拥于网络空间,“网民们的表现欲、想象力、自我意识和深层诉求都能够在网络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书写”^⑥,致使网络意识形态供给内容的纷繁冗杂,尤其是“在一国的网络疆域内,本土

①王玉科:《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网络治理探析》,《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②王永贵:《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234页。

③张学亮、王永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实践逻辑》,《理论导刊》2016年第7期。

④杨嵘均:《论网络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策略》,《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

⑥陈纯柱:《网络语言的生成、价值和特征研究》,《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的网络意识形态与域外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缠绕交织、错综复杂。”^①就其性质来看,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主要分为三类:即主流意识形态、中性非主流意识形态和异质性非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逻辑出发点和关键发力点。中性非主流意识形态是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既不完全一致,也不根本冲突的意识形态。这类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言可兹借鉴学习,但部分思潮在供给过程中富有争议性,一方面它们吸收了西方意识形态中的合理内容,针对当下中国转型期出现的与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有所出入的社会事件,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质疑与批判。另一方面又往往利用极端的、偏见的言语导向来激化利益受损的网民群体与政府的矛盾,“其不理性的绝对化的宣泄方式,也造成了网民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失去共识。”^②而异质性非主流意识形态则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错误意识形态,也是我国网络意识形态供给过程中必须积极防御、认真抵御、彻底粉碎的意识形态。这类意识形态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恶意操纵下,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主流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国史、党史进行恣意歪曲、妄加抹黑,企图混淆网民的视线与价值判断,可谓目的险恶、用心良苦。加之部分网民警惕意识不高、辨识能力不强,错误意识形态借此让部分价值立场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一致的网民,特别是现实生活中利益受损的网民群体感受到了“价值契合”和“精神满足”,他们“利用大众的非理性情绪,散布各种危害党和国家形象的‘病毒信息’,引发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③这两类非主流意识形态之中所蕴涵的各类网络社会思潮,既有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向声音,也有在回应社会事件时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阶级色彩和不理性的个人情感色彩的争议性意识形态存在,夹杂着“资本主义社会滋养的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消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肆虐。”^④综上可知,无论是何种非主流意识形态都会直接或间接对主流意识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和离散,甚或在非理性的方式引导下直接“兵戎相见”抑或“擦枪走火”,极大地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与稳定。

(三) 供给方式单一化,弱化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

供给方式是提高意识形态供给内容吸引力、穿透力、影响力的关键步骤。积极向上的意识形态供给内容能否在网络空间中取得网民的“信任”“青睐”直至“追捧”,主要取决于其供给方式是否贴近网民生活、反映网民利益、符合网民期待,“要提升供给的有效性,就必须创新供给方式,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掌握群众,使主流意识形态真正为公众所接受和认同。”^⑤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供给方式的单一化主要是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供给侧而言的。一方面,代表党和国家的官方媒介在日常宣传中仍多采用传统的大篇幅的宣讲方式,以研究报告、学术论文、新闻报道等宏大叙事为主,“在风格上带有精英化倾向,导致受众范围较狭窄,通常都以党员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学者、学生等群体为主,一般大众很难接受。”^⑥另一方面,传统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自上而下的灌输形式。伴随网络技术的深入发展和纵深运用,“人们可以抛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无所顾忌地在网络中尽情披露信息、抒发感受、发表意见、品评时事、参与互动,形成了全民发声的新格局”^⑦,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身份的平等性已然形成,党和国家不再可以凭借身份的特殊性来对网民进行单向的意识形态灌输,“对于‘灌输’的内容,民众会产生一定的逆反心理,同时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时所附着的形式进行挑

①郑元景:《当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变迁与重构》,《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6期。

②高建华:《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2年。

③杨永志:《互联网条件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0页。

④彭洲飞:《聚焦网络意识形态最新态势:挑战与思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⑤张学亮,王永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实践逻辑》,《理论导刊》2016年第7期。

⑥蔡泉水:《新媒体环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16年。

⑦吴青熹:《网络公共领域发展与新型政社关系建构》,《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剔。”^①所以,尽管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在网络空间中高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在网站建设、内容更新、传播手段等供给方式方面存在着明显缺陷和不足,仅仅依靠垂直、单向、权威的灌输方式向网民输出主流意识形态,缺乏与网民的真正互动交流,难以及时掌握网民的思想动态和舆论舆情的发展走向,供给内容滞后于网民意识的更新,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网民思想境界,提升网民精神感悟的功能得不到充分体现,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网民的吸引力与凝聚力。

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改革新动向

综上所述,伴随互联网纵深发展所衍生的诸多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强烈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推动和改变着经济和社会生活,并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发展。”^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着力通过网络意识形态的供给侧视域进行顶层设计,优化供给结构引导需求的结构调整与升级,全面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 德法兼治,严格规范意识形态供给主体行为

供给主体是网络意识形态形成的源头和根基,为此,准确把握供给主体的思想动向、意识主张、价值诉求,是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和基础。习近平指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许多错误思潮也都以网络为温床生成发酵。在这个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上,能够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③,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④为此,党和国家从法治和德治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快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各类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主体的行为约束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内,同时加快推进网络实名制的认证工作,确保对每一供给主体实际有效监控,及时对宣传错误意识形态的主体采取积极回击,避免网络空间成为错误意识形态滋生的温床。习近平强调:“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言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图书、讲坛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⑤,要“形成良好网上舆论氛围,不是说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而是说不能搬弄是非、颠倒黑白、造谣生事、违法犯罪,不能超越了宪法法律界限。”^⑥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对发表不当言论的网络个人或网站予以惩处或取缔,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出台更是为规范意识形态供给主体行为提供了完善的法律依据——“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等活动。”^⑦并且提出“网络运营者应当建立网络信息安全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方式等信息,及时受理并处理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的投诉和举报。”^⑧另一方面,党和国家也意识到法律的严格管控并不能完全杜绝网络主体对错误意识形态的宣传,仍要注重发挥道德规范在网络空间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德治强化

① 顾译文:《自媒体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困境及对策研究》,《武汉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② 杨正泉:《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310页。

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第220页。

④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193页。

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8页。

⑥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17页。

各意识形态供给主体的思想道德素质,主动与错误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积极弘扬中国优秀文化成果。诚如习近平所言:“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①,基于此,我们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②因此,在德治与法治并行并重的治理模式下,我国网络空间散布错误舆论的主体大幅度缩减,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也趋于稳固。

（二）着力净化,严厉防范错误意识形态内容泛滥

“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人的集中活动区域。”^③作为人类生活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网络空间仍旧是一个网民的政治思维尚未形成理性模式,运行秩序尚未走向良好轨道,社会主义崇高理想信念尚未全民化的复杂空间,在此空间内,大众文化超越精英文化而成主流,低俗文化风行网络而致追捧,错误思潮滋生蔓延以至泛滥,“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指鹿为马,三人成虎,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④因此,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就必须下定决心、找准角度,从供给侧方向出发着力净化,严防错误意识形态内容泛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通过网络宣扬分裂国家、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以及恐怖主义,使用欺诈手段损害人民利益,散布违法信息,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尤其恶意攻击正向发声的网络“大V”使其污名化,使他们不敢秉持正义之言,这些做法必须“坚决制止和打击,绝不能任其大行其道。”^⑤从供给侧角度出发,一方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网络舆论的管控、网络谣言的规制、网络犯罪的惩治,严格加强对网络信息传播的审查与监管,坚决杜绝一切有害信息的传播,“对那些攻击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抹黑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革命史、诋毁党和国家基本制度的言行给予严厉有力的回击。”^⑥另一方面,以党办网站、党办媒体为主力阵地,“落实谁主管谁主办和属地管理”^⑦,切实“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要纳入管理范围,所有新闻信息服务和相关业务从业人员都要实行准入管理。”^⑧同时,联合政治素养过硬、政策水平熟悉、业务能力精通的党员干部与理论水平深厚、思想觉悟高尚的专家学者,组建抗击错误意识形态的知识化、专业化网络队伍。

（三）灵活整合,科学汇纳非主流意识形态合理成分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曾经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够参加并且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⑨所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有效供给,意味着既要严肃肃清错误意识形态的思想毒瘤,时刻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主体性地位和指导性作用,更要灵活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中包含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补充成分,以形成更为全面考量网民精神诉求的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界不是僵化的固定不变的,其边界在多元意识形态的博弈中具有动态性。”^⑩尤其是在全面深入推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85页。

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205页。

③刘希刚、徐民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历史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5页。

④《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7页。

⑤《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页。

⑥何怀远、彭洲飞:《聚焦网络意识形态最新态势:挑战与思考》,《唯实》2016年第3期。

⑦《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54页。

⑧《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42—43页。

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8页。

⑩张爱军:《网络意识形态去中心化及其治理》,《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1期。

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民众在网络中所反映的思想观点、精神需求以及利益诉求伴随市场化条件的改变同样发生着转变,有时甚至演变为突变。过去“小众”或是违背主流价值观的立场、观点伴随时代与潮流的演进逐渐成为“大众”的集体呼吁,其本质特征也应由非主流意识形态走向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未能及时更新,而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中充分体现的价值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通过客观考察以及合理转化来加以吸纳,以开放性与包容性来应对网民思想的千变万化,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民的有效供给。当然,非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涵盖主流意识形态未能体现的合理成分,同时两者也在某些价值思想上重合、相似,比如民族主义的爱国情怀、自由主义的法治思想等。我们应注重体现自身的优势,对比吸收这些合理思想和积极主张,一方面能够昭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点并非“一家之言”,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科学汇纳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和理论优势,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从对抗到对话,从冲突到融合,从求同到存异乃至尊异的巨大转变。”^①

(四) 夯实舆论阵地,大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力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成熟运用使得互联网成为更具影响力的新闻舆论阵地,但“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更具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②,势必给主流媒体所起主导作用带来巨大压力和巨大冲击,“大大增加了舆论引导和内容管理的难度。”^③为此,必须“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握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安邦定国的大事。”^⑤基于此,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借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在网络空间的持续发力和举旗定力,通过官媒、党网向网民输出主流意识形态,丰富网民的精神世界,增强网民的精神力量,抵御网络的不良信息。习近平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⑥这短短的48个字,继承并创新发展了我们党对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的一贯精神,是对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最集中最鲜明最准确的概括,体现了新时代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新要求,指明了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努力方向。十八大以来,党媒、官媒始终坚持党和国家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在网络中积极做好正面宣传,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供给的自信与底气。通过回顾革命历史、讲述改革心路、展望未来发展,向网民展示党和国家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出发点、思考点和利益落脚点都是人民,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反映人民精神需要的价值理念,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人民最好的精神补给品。同时,各大官网、党网联合众多学者、专家共同发声,“理直气壮唱响网上主旋律。”^⑦不仅向网民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合法性,更是主动回应错误意识形态的不当言论和挑衅行为,对其抹黑、歪曲言词予以坚决反驳,持续亮明我国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态度与决心。许多党员个人和理论学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网络空间中发文、发图以体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并且结合生活体验与感悟,向网民进行有血有肉的思想价值引

①王秋梅:《主流引领与和谐共生—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3期。

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第216页。

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第216页。

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第216页。

⑤习近平:《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党建》2016年第3期。

⑥杜尚泽:《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

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204页。

导。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有效运作,网络上的“红色地带”越来越多,“黑色地带”和“灰色地带”则逐渐消退,党和国家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不断强化,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卓有成效。

综上,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嫁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思路,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①的总要求,一方面持续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大力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②,另一方面深入推进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治理强大合力”^③,同时着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依规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构建良好网络秩序。”^④通过对供给端的顶层设计,坚持遵循德法兼治并举,着力净化,做好灵活整合利益,增强有效运作方式,敢于亮剑,主动出击,全面打响网络意识形态攻坚战,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向释放“最大正能量”迈进。

(责任编辑:蒋永华 石亚兵)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Cyberspace Ide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YUE Aiwu

Abstract: The global advancement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created a new form of person-to-person connection. This has broken up the original limits in time and space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formed our ways of production, living, and thinking. Correspondingly, cyberspace has become the battlefield overnight where different thoughts, ideas and beliefs compete for dominance. It constitutes a new sphere for ideology. At present, there are great imbalances in the supply-side of ideology: for example, the organization of suppliers is fragmented; what is supplied is redundant; and the means for supply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re monotonously limited. These inadequacies not only adversely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cyberspace but disturb the order of 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ith Xi Jinping as the core has introduced the economic no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to the ideological area. A comprehensively deepened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ideology involv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ideology suppliers should be under strict legal and ethical regulations; the harmful and dangerous ideas online should be controlled and eliminated; some sound non-mainstream ideologie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he position held by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public opinion should be consolidated through improv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Key words: cyberspace; internet ideolog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bout the author: YUE Aiwu, PhD in Law, is Postdoctoral Fellow at Center for Socialist Ideology Research,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he is also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第220页。

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第221页。

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第221页。

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第221页。